

数字经济空间的资本加速循环动因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

尹凡华

摘要：顺应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由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以及数字劳动所塑造的经济空间深刻改变着资本的循环运动：数字技术的渗透与扩散为资本加速循环提供底层支撑力；数据要素在自由流动中赋能资本循环全过程，充分释放了资本的增殖潜力；数字平台所具有的网络效应缩短了资本循环中的生产与流通时间；数字劳动方式的出现则拓展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关键词：资本循环；数字技术；数据；平台；数字劳动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5) 01-0087-09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网络基础设施、智能机的升级迭代以及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近年来，数字经济在“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1]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我国紧紧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多次从战略层面布局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蓝图，以“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数字经济空间作为一种涵盖人工智能、数据、社交媒体等不同层面的社会空间，“是由在一个既定社会里获得的特定社会关系决定的”^[3]。数字经济具有网络分布与去中心化的技术特征，将破除传统的经济要素空间组织模式，重塑我国

经济空间发展格局。比如，传统区域空间中的点、线、面被赋予新的涵义，并向要素流动空间与地理场所空间交互作用的新型网络空间过渡。虚拟空间网络、物理空间网络、地理空间网络等多维立体空间网络的紧密耦合，有助于打破各类行政界限，促进资本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与循环速度^[4]。

资本循环是指产业资本以货币资本形式为起点，顺次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实现价值增殖并回到原点的全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 $G-W \cdots P \cdots W'-G'$ 的公式抽象地刻画了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5]：在第一阶段 $G-W$ 中，货币被用于交换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即货币资本 G 转换为商品资本 W 。这种转换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循环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所交换的商

品并没有进入消费环节,而是进入了生产过程。在第二阶段 $W \cdots P \cdots W'$ 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并转化为一定数量的新商品 W' 。这些新的商品与最初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之间存在质的差异,前者包含了新增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因此,商品资本 W' 作为已经增殖了的资本的特定形式,它被出售后将转换为比 W 更高的价值。在第三阶段 $W' \rightarrow G'$ 中,新生产的商品被出售并换来货币,即包含新增价值的商品资本 W' 转换为货币资本 G' 。这样,资本又回到了其初始的货币形式,成为新一轮循环的起点。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呈现出加速循环的态势。从传统跨国公司与平台经济巨头市值的平均增速来看,每创造1万亿美元的市值,传统跨国公司需要305年,而平台经济巨头只需要27年^[6]。那么,如何解构资本加速循环的内在机理?有学者从资本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的辩证关系出发,特别强调数字技术的个性化和连通性特性与资本流通的加速逻辑相统一^[7]。有学者认为数据要素对资本循环有特殊意义,原因在于数据作为当前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增强了资本统治力度,扩大了资本增殖空间^[8]。还有学者注意到,作为数字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数字平台以“无形”的网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资本循环效率^[9]。此外,一些政治经济学研究考察了劳动在数字经济场景下的嬗变,指出平台经济中去劳动关系化的形式并未超越《资本论》的论述,数字劳工的雇佣形式与非雇佣形式成为加速资本增殖的方法^[10]。

为了探寻数字经济场景下资本加速循环的现实逻辑,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基础范畴分析新的经济形态下资本形式加速变换的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结合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兴事物的出现,分析加速资本循环的四个主要驱动力。这四个主要驱动力同时呈现出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数字技术的渗透与扩散为资本加速循环提供底层支撑力。数据要素在自由流动中赋能资本循环全过程,充分释放了资本的增殖潜力。数字平台所具有的网络效应缩短了资本循环中的生产与流通时间。数字劳动方式的出现则拓展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二、数字技术:资本加速循环的基底

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1] 生产力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三要素,科学技术全面渗透于三要素中。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技术革命,数字技术主要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这几者融合发展,不分轻重先后,数字技术渗透资本循环全环节,有助于减少交易摩擦并促成交易发生。

(一) 数字技术是资本加速循环的驱动力量

互联网拓展了人们的交互空间,日渐覆盖物理世界,所有人、事、物、组织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数据,时至今日,人类社会所积累的静态数据、动态数据以及数据互补融合后的叠加数据之大,已经难以用传统方法处理。由此,大数据可以被定义为“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传统IT技术和软硬件工具对其进行感知、获取、管理、处理和服务的数据集合”,具有体量浩大、模态繁多、生成快速、低价值密度等特点^[12]。从资本循环过程看,大数据的核心在于通过数据挖掘分析出数据间的关联性,洞悉隐藏在海量数据中的规律,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依据并持续优化资本运动全流程。例如,在 $W \cdots P \cdots W'$ 阶段,大数据可以帮助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实现对库存、物流、生产等方面的实时监控和调整,降低库存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在 $W' \rightarrow G'$ 阶段,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收集消费者的需求、喜好、购买力等信息,从而精准地定位产品 and 市场。

云计算是算力基础设施。数字时代云计算技术是通过网络提供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应用程序等服务的技术,因此,“云”实质是一个提供多种计算资源的网络。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白皮书(2023年)》预测,到2025年,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人民币。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对象主要是数字信息和海量数据,劳动者和企业在处理数据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算力需求,而“云”这种计算资源共享池就像电厂、自来水厂一样为社会提供便利而廉价的算力资源。每一个使用互联网的人都可以触达网络上庞大的计算资源和数据中心,使用者可随时按需取用,

按使用量付费。对于企业来说,若为了满足算力需求而属地化部署私有服务器,这不仅要在初期付出高额的固定资本投入,还要承担运维、电费等成本,中小型企业难以承担这些费用,云计算作为数字化生产平台降低了企业的固定资本投入,建立在“云”上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节省了社会总固定资本投入。数字时代的劳动场所将不再只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地点,它更像一个交流信息、促进协作的空间,一个提供舒适劳动环境的空间,对于进行数字劳动的劳动者来说,其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门槛大大降低,劳动者仅需一个能接通互联网的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就能参与生产过程,这意味着劳动场所不受固定时空限制。

人工智能是“萃取”数据要素价值的工具。人工智能是指用人工的方法在机器上实现的智能,或者说是人们使机器具有类似于人的智能^[13]。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计算智能。机器具备超越人脑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在海量数据中深度学习,从过往经验中获取新知并应用于当前环境。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支撑着计算智能的建立和发展。其二是感知智能。机器具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能力,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智能机器人等技术都属于感知智能。其三是认知智能。机器能够像人脑一样“理解”和“思考”,具有推理和预测能力。诸如 DeepSeek、ChatGPT、文心一言、智谱清言等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均属于认知智能层面。企业在生产经营各环节沉淀了大量数据,而挖掘大数据中隐藏的且有价值的信息难以由人力完成。人工智能在云计算提供的算力支持下将数据过滤为信息,信息经智能算法处理后形成决策依据。例如,一些企业在用户管理中引入智能化模型,它能够自动识别与筛选不同忠诚度的用户,并自动针对性地推出提高用户黏性的营销策略。

区块链塑造新的分工协作关系。如果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变革,那么区块链技术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更为深刻。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或数据库,它可以记录不同参与者在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交

易及结果,数据在得到所有参与者的共识后被“打包”成区块,区块按照时间序列串联并由密码学保证其传输和访问安全。任何人都可以对数据区块进行核查,但没有人能单独对其控制。区块链技术有两个突出特点:去中心化和信息不可篡改。区块链的运作过程不依赖中心节点,能够实现端到端的匿名自由连接并进行信息、数据乃至资产交换。此外,由于区块之间通过密码学证明的方式首尾链接在一起,若要修改某个历史区块中的信息就必须将其之前所有区块进行重构,因此,这种机制能够有效防止信息篡改。基于这两大特点,区块链技术开创了一种新的交换与协作模式:它能在信息不透明的竞争环境中低成本地创造信任、传递信任并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或协作。在市场经济中,信任关系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问题。网购是出于对交易平台的信任,投资理财是出于对金融机构的信任,而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各方市场主体在第三方担保缺位的情况下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这意味着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从商品资本再到货币资本的资本形态转换效率提高了。

(二) 数字技术应用减少了交易成本

数字技术降低交换过程中的成本。马克思认为,交换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14]。资本在售卖阶段的形态变化是整个资本循环过程中最关键的,马克思称其为“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15]传统的交换过程中存在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库存和物流配送效率低等潜在交易摩擦,这些交易摩擦带来包括搜索、运输、追踪和验证等一系列交易中的成本。数字技术在多方面改造交换过程,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构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场景和新渠道,从而有助于降低上述成本。首先,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接入整合了大量商品信息的虚拟交易平台,在关键词搜索、个性化推送和消费反馈信息的辅助下更方便找到匹配其偏好的产品。消费者的搜寻成本降低。其次,现代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降低了城市之间、

城乡之间的物流成本,数字技术能够进一步优化配送方案,提高运输精确性。例如,在快递配送、外卖配送等场景下,智能算法能够自动为配送员设计最优路线,从而为其规避“冤枉路”。再次,数字技术降低了企业追踪消费需求的成本。消费者在互联网上浏览、点击以及进行商品评价等数字痕迹能够被企业追踪。相较于传统使用问卷、邮件等市场调研方法,数字技术使企业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收集消费者偏好数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用户“画像”。也就是说,企业对消费者需求的预测成本降低、生产的柔性化增强。最后,数字技术降低了交易双方验证身份和信誉的成本,从而更好促成交易。企业和消费者均能在数字交易平台上获取对方的信誉、历史交易记录等信息,这就降低了多次博弈过程中的验证成本并促进彼此信任。

数字技术还促进信用创造机制变革,从而提高资本循环效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指出,每笔商业交易都包含信任的成分。信誉是整个社会顺畅运行的重要润滑剂,能够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信任能够克服因交易主体彼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摩擦,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促成交易发生。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信任发生机制更加多元,数字基础设施也为更多个体之间的信任创造提供了便利。概言之,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原因在于数字时代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更容易被记录,这为个体信用度评估提供了基本依据。例如,信用评级公司能够基于消费者的身份特征、消费习惯、资产状况、社交网络等数据构建评价模型,并输出相应信用评分。具有良好信用评分的个人能够享受如先用后付、快速退货等服务。此外,以往信用水平不高的中小商户也容易享受到信贷服务。

三、数据要素为资本加速循环提供原材料

数字经济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将一切事物或行为转化为可以进入云计算界面的数据。数据要素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和较强的流动性,为资本加速循环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一) 数据要素渗透资本循环的全过程

数据是指可以被编码为一系列“0”“1”组成的二进制序列的信息。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

数据已快速融入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受制于要素稀缺性,难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无论是企业单个资本循环还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循环都呈现加速态势,这与数据所具有的独特性密切相关。

第一,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传统生产要素具有明显的稀缺性和竞争性。例如,某人使用资本或劳动力便阻止了其他人使用该资本或劳动力。数据作为轻资产,容易储存且可复制性强,用途广泛且同时被多个用户使用也互不影响,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倍增效应,彻底颠覆了传统生产要素的使用局限。第二,数据要素具有多样性与互补性。大数据规模浩大却价值密度低,其价值在于数据间的关联性,来源不同的数据相互融合有助于提高其揭示潜藏规律的能力,从而增加单一数据源的边际价值。第三,数据要素具有无限增长性。数据产生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其在应用或共享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数据,形成“数据—算法—数据”的自我积累增长过程。随着全球互联与万物互联以及算力的不断增强,数据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为实现规模经济创造了条件。

数据要素广泛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其具有的非竞争性、互补性、指数级增殖性特征使其成为持续赋能和扩展现代经济增长空间的关键变量。在生产环节,传统生产观念是以生产者为中心,遵循线性的生产模式,即先在生产企业内部产生创意想法,再进行市场调研,继而进行产品测试与量产。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观念则以消费者为中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界限日渐模糊,消费需求引领生产供给的作用增强。这一时期资本无节制增殖的本性仍然不变,但资本在生产阶段 $P \cdots W'$ 运动速度加快,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发展和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生产者快速感知消费者需求,进行更快捷的产品设计和原型测试,使产品更好触达消费者,同时生产者在售后可以通过数据完全掌握消费者的使用感受,为进一步改进生产和服务提供参考。数字化为个人转变为消费者提供有利条件,无论是像3D打印、开源软件等生产工具的创新,还是各种论坛与社交软件等产品和服务发布渠道的多样化,

抑或个人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作用,个人将创意转化为产品的条件更为充足,甚至其产品可与大中型企业形成竞争,进而有可能引领未来潮流。在交换环节,传统的经济循环过程将其与其他环节相独立,注重一般等价物货币与商人中介的作用。数字经济时代的消费端日益呈现一定程度的组织化,能够主动掌控或优化交换环节,进而与生产端相融合。诸如数字人直播带货、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营销等新兴营销模式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来,人、货、场线上线下全网全渠道融合的样态逐渐成熟,让端到端的全链路精准高效的匹配成为现实,缩短了资本流通时间而增加了剩余价值。在消费环节,传统的消费受制于生产限制。在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数据要素的出现促使更多的新产品接连涌现,进而使消费变得多元化,提高消费者效用水平;另一方面生产端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研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与满足个性化需要的长尾产品,使消费者的消费体验越来越好。

(二) 数据自由流动贯穿资本循环全过程

流动性是生产要素产生价值的基本前提^[16]。只有通过流动,才有助于寻求要素的最佳配置方式,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因此,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7]。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制约下,地域性特征明显,流动性较低。数据生产要素的前述特性决定了其流动性要远高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数据资源能够在单位内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

数据要素在资本运动各阶段自由流动,信息是要素资源优化的“向导”。在工业时代,资本要素优化配置受制于信息传播媒介单一、传播主体较为权威与集中、传播客体同质性较强以及地理空间狭窄等因素。数字经济时代移动互联渗透率提高,投资信息得以广泛传播,资本流动更加便捷。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技术创新和新兴商业模式的金融科技可以加快金融多样化和去中介化步伐,创造一个更大规模、更具竞争力、更多样化的信贷市场,提高了金融可获得性,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在资本循环的生产阶段 $W \cdots P \cdots W'$, 自由流动的数据有助于提高企业

决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反映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行为特征与偏好等数据会融入生产过程,企业能够据此持续优化产品研发、制造、销售、运营等环节,赋能企业产品生产全过程。此外,数据的应用过程本身也可以产生更多元的新数据,这将促使生产端对消费端的需求分析更加精准,从而生产出更具针对性的商品。在资本循环的售卖阶段 $W' \rightarrow G'$, 自由流动的数据可以助力企业节约更多的销售推广成本。数字经济时代不同产品或服务的互补性和相关性很强,且提供相关系列商品的成本较低,加之有巨大的使用者数量和强大的网络连接性,平台型企业更加注重提高投入和资产的通用性,也就是说,在一种平台上提供多种产品和服务,能够充分发挥范围经济的特性。例如,美团通过其平台和配送体系,不仅提供外卖餐饮服务,还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看病买药等服务,充分发挥了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了用户的黏性。

数据要素的积累与扩散能够提高其他要素的配置效率。数字经济时代,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更加显著。就技术要素而言,一方面,数据要素加快了技术积累和迭代的进程。科技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系统且高可信度的科学数据,以及对科学数据的综合分析和挖掘。如人工智能可以在海量数据中模拟组成特定功能的蛋白质,从而降低科研风险与成本,缩短科研周期。另一方面,数据要素加快了技术扩散的速度。数字化的资料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实时传递,这压缩了技术扩散的时间和空间。开源软件与知识社区的涌现使更多主体可以参与技术改进与知识传播,加速技术外溢。就劳动力要素而言,由于传统经济中劳动力供求信息不对称,劳动者的职位信息搜寻成本高、求职过程耗时长。互联网求职平台集中且全面地汇集了劳动力供求信息,求职者的信息搜寻成本降低,劳动力配置效率提高。线上会议、线上诊疗、线上办公等劳动形式突破了特定时空的限制,劳动者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有所减少。就数据的跨境流动而言,全球数据要素流动不仅是释放数据红利、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估计,数据流动使得美国的GDP增加了3.4至4.8个百分点,同时创造了240万个就业岗位^[18]。总之,数据要素的引入可以更好发挥各类生产要素的独特优势,并与其他要素形成协同关系,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实现数据要素的乘数作用。

四、数字平台依托网络效应加速资本循环

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场景下资本循环的重要场景。数字平台以其中介属性整合了购买、支付、物流等功能,同用户结成“强绑定”关系,塑造了规模庞大的在线消费市场,从而成为资本价值增殖最大和最具潜力的空间^[19]。数字平台能够形成即时响应的供求匹配网络,并迅速触达交易两端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两端,缩短资本循环中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

(一) 数字平台是数据要素参与资本循环的场景

平台并不是数字经济所特有的事物。平台本质必然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例如集市、商场等交易场所是“有形”的实体平台,但存在规模有限、时空相对固定、连接用户成本较高等局限性。从商业组织模式来看,数字平台与传统包买商的本质相类似,即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中介作用并获取相应份额的回报。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数字平台能够实现更大程度的集约:不仅产品采购、仓储物流以及供应链金融等各环节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而且生产商、供应商、广告商、顾客甚至物质对象都汇集在同一个网络,以此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点对点连接,为社会化生产提供更丰富与精确的数据,便利商品流通。

从社会生产组织形态来说,相较于19世纪的工厂和20世纪的跨国公司,平台经济体成为21世纪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平台经济体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平等性。平台经济体不同于跨国公司的链式组织方式,而采取“云端制”组织方式,平台企业与用户、商家、服务商之间并非依附关系,而是平等关系。这有助于活跃平台上的各方参与者,构建平台良性生态系统。二是普惠性。各类经济体都可以分享平台企业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实惠。例如,平台企业成为连接贫困偏远地区与外界广阔市场的纽带和桥梁,成

为消除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中介。售卖阶段W'—G'能否实现以及资本形式转变所需的流通时间将直接影响资本循环的速度。相较于直接交易与传统中间商,数字平台在新兴技术的支持下通过网络效应为海量供给端和需求端提供虚拟交易场所,其及时精准匹配的特性节省了纯粹流通费用,投入的固定成本也能被资本循环次数的增加而摊薄。

(二) 数字平台缩短资本循环的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

在资本循环过程中,资本的生产时间包括资本处于生产领域的时间、自然力对劳动对象作用时间、劳动时间、生产资料的储备时间、停工时间等,这一时间并未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资本的流通时间是指资本在流通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包括寻找卖家的货币资本形式与寻找买家的商品资本形式。由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发生于劳动时间内,即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生产出某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于是,生产者总是尽量压缩纯粹劳动时间之外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流通费用产生于流通过程中,包括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前者可以增加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后者则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这一费用降低意味着剩余价值留存更多)。

数字平台塑造了具有小世界性的增殖运动空间。小世界网络是复杂网络的典型形态之一,网络中存在连接度较高的中心节点且平均路径较短,也就是说,网络中各节点依托少数中心节点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这意味着相较于传统线性商业模式,小世界网络中各节点交互效率高且成本低。数字平台作为中心节点连接和协调了生产者、消费者以及物流服务者等各类主体,主体间不再需要辗转冗长的流程来相互连通,可以直接借助平台这一中心节点建立直接连接。这意味着平台缩短了主体之间的路径长度,从生产到消费之间节点的数量减少,可及性增强。比如,消费者通过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可以直接购得所需,生产商在平台获取订单信息后能及时借助物流网络触达消费者,这中间无须再经手多级中间商。这种以平台为中心的小世界网络可以使企业预付的

货币资本能够更快回流,即资本循环效率提高。同时,数字平台拓展了资本循环的时空边界。数字平台作为资本扩张的虚体空间,使商品买卖实现了从自然空间到社会空间,再到数字空间的拓展。比如,服务业以往被认为是“低效率”的产业,教育、商业演出等服务活动的效益拓展受时空限制较大。数字经济场景下数字平台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线上教育平台、知识社区、视频门户网站等服务模式拓展了价值实现的时空边界。资本不仅可以支配和使用“自然力”实现全球性扩张,让“社会总体工人”和“国际性社会总体工人”不断创造价值^[20]。平台经济模式下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不仅仅限于企业内部、行业内部与市场内部,而是扩大至超越时空和国界的国际性分工和协作。在资本逻辑驱动下,这种分工与协作体系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数字技术体系、网络化生产和销售体系、具备新技能的劳动者与新兴生产资料相互结合的劳动过程,实现了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和服务的全球性协作。

五、雇佣和非雇佣数字劳动提升剩余价值率

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数字平台将雇佣数字劳动与非雇佣数字劳动共同纳入资本的生产体系之中,从而拓展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一) 雇佣数字劳动没有改变资本的剥削实质

数字资本主导的平台经济改变了传统工业劳动模式,产生了一种新型劳动形式——数字劳动,可以将其理解为生产数据的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数字平台将雇佣数字劳动与非雇佣数字劳动共同纳入生产体系,从而拓展了剩余价值的生成渠道。雇佣数字劳动是指企业内部雇佣劳动者生产数据的劳动形式。比如信息技术企业的雇佣员工在工作中生产与处理的数据被用于生产与服务。

数字劳动方式的出现并未改变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与剥削本质。一方面,雇佣数字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时间延长。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中,资本不仅不满足于占有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像狼一般地”侵占着工人的再生产时间,使工人成为“人格化的劳动时间”^[21],突破了劳动的道德和纯粹身体的极限,数字劳工俨然成为现时代的一种“役畜”^[22]。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方式趋

于虚拟化、灵活化和自主化;劳动时间由“朝九晚五”的固定模式扩充为“见缝插针”的碎片化模式;劳动空间由工厂等固定场所转为“线上”“云上”等虚拟场所;劳动资料由机器设备等重资产转为数字媒介等轻资产。这些变化打破了劳动者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界限,使其可以无缝对接工作与生活,从而被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体系之中。另外,数字技术赋能监督有助于压缩劳动者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将非生产时间控制在较低限度,从而绝对延长工作日。对于雇佣数字劳动者来说,其通过使用隶属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来处理分析网络用户产生的数据原材料,这种劳动成果最终却是资本家的所有物。

另一方面,雇佣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加大。

“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23]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中,资本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来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度和生产效率,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数字技术赋能监督加强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例如,企业通过应用摄像头、监视器、可穿戴机器人等数字化工具实现对劳动场景全天候、全环节的监督与引导,提升了对劳动者的监督效率,降低了劳动者出错的概率,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另外,处于数字资本企业中的技术工人(如程序员、软件开发人员)凭借数字专业技能或者创新能力获取劳动报酬。然而,由于新生产工具的出现以及为降低成本,数字资本企业引入外部竞争成为一种选择。也就是说,数字资本企业通过众包、分包和外包的方式,降低研发投入,减少标准劳动合同的签订。外部竞争市场的出现增强了技术工人的危机意识,促使其不得不形成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既要长时间加班劳动又要提升技术创新效率,从而将个人的能力商品化以适应公司内外部市场竞争。

(二) 非雇佣数字劳动拓展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数字经济时代非雇佣数字劳动广泛参与生产,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重要来源。

所谓非雇佣数字劳动,是指数据的生产主体处于企业雇佣体系之外,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一种

劳动形式。比如当庞大的用户同意使用相关软件服务条款时,就潜在地与平台资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隐形雇佣合约”,即平台资本可以低成本甚至免费占有用户数字劳动及其劳动成果。

非雇佣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相重叠,无限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数字化为个人转变为生产者和创新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模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作为非雇佣数字劳动的生产消费者(产消者),劳动以消费、休闲、娱乐的方式进行,既在生产中消费,又在消费中生产,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在为平台资本生产剩余价值。比如,产消者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创作产品、浏览新闻或广告、与他人交谈等,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产消者的休闲时间同时也成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相较于零工,产消者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这不仅扩大了其“休闲”范围,而且提升了其劳动强度。比如,网络主播的工作时间常常超过八小时工作日的限制,平台资本通过这种看似“合理”地延长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时间的方式,获得了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为扩大平台规模积累了更多资本。

非雇佣数字劳动者栖于多个平台,劳资关系向松散型转变。不同于传统的“企业——员工”模式,“平台——个人”模式催生了零工经济,形成了“中心——散点”结构,这种新的经济模式扩大了平台零工的竞争形势。平台的通用性与标准化降低了数字劳动者的进入门槛,致使零工处于长期的劳动力买方市场,进而强化平台对劳动报酬的决定权。零工为了实现生活资料和人自身的生产,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其“多栖性”的特征并非解放了自身,反而受到不同平台的约束。此外,由于新型劳动形式并未形成标准化的劳动合同,也就是说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劳资关系,于是企业减少了在劳动者社会保障方面(如福利、失业保险等)的可变资本投入。即便如此,劳动者在制度保障缺位的情况下仍自愿延长劳动时间。这是因为非雇佣数字劳动的薪酬相较于传统按期支付的形式,更多体现为即刻兑现,也就是说,薪酬激励更为及时和隐蔽,这有

助于激发劳动者对更高报酬的追求。更为关键的是,资本通过对劳动者自主性意志的培养,将激励约束交给员工本身,潜移默化地构建一种剥削的“同意”,从而使劳动者自愿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相较于传统雇佣劳动关系,“平台——个人”模式下去劳动关系化现象普遍。平台资本将自由劳动和雇佣劳动囊括进来,并且想方设法减少有偿劳动,最大化占有无偿劳动,以进行剩余价值攫取。总而言之,劳动时空限制的消解并不意味着劳动时间和强度的解放,反而激起资本更大力度的施压。

非雇佣数字劳动被纳入生产过程,大大拓展了剩余价值的生成渠道。在资本循环的总公式 $G—W \cdots P \cdots W'—G'$ 中,价值增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得到了购买和使用。而为了“使用”这种商品,即在生产过程中运用劳动,生产资料(原料、机器等)就是必需的。其中,可变资本 v 是为雇佣劳动力而支出的劳动力价值,即工资。工人为产品增加了多少价值,并不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有多少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被耗费。剩余价值 m 就是新增加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差额。劳动力的价值(其再生产所必要的价值)低于通过劳动力的耗费而创造的价值,正是价值具有创造价值的“奇能”的基础。即工人被支付的是 v ,却产出 $v+m$ 的新价值。当非雇佣劳动纳入生产过程中, m 就是雇佣数字劳动 m_1 和非雇佣数字劳动 m_2 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之和,即 $m=m_1+m_2$ 。那么,剩余价值率 $m' = m/v = (m_1+m_2)/v$ ^[24]。由此可以得出,资本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新兴技术的垄断提高非雇佣数字劳动的作用,由此提升剩余价值率,加快数字经济空间资本循环的速度。

六、结语

从资本加速循环的分析过程来看,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空间资本增殖速度加快的关键因素。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究,即这种加速循环的态势不一定能够一直维持。原因在于,数字技术的异化、数据共享开放与数据垄断、数字平台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数字劳动异化等问题相伴

而生。为了促进资本的良性循环,必须从根本上让这些关键因素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以社会主义应用逻辑代替资本主义应用逻辑。其一,积极发挥数字技术在解放社会生产力方面的正面作用。其二,积极推动数据要素的共创共享,构建新型数据生产关系。其三,充分利用数字平台作为人的劳动解放的中介场所。其四,努力消解劳动异化,实现劳动解放。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 求是, 2022, (2).
- [2]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04.
- [3] [美] 尼尔·史密斯. 不平衡发展: 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付清松,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137.
- [4] 徐浩然, 胡建涛. 数字时代资本循环何以加速[N]. 学习时报, 2023-08-11.
- [5] [德]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资本论》导论[M]. 张义修, 房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108.
- [6] 陈昌盛, 许伟. 数字时代的宏观经济管理变革[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143.
- [7] 张亮. 数字资本主义“流通视域”观照下的反思与批判——数字技术赋能资本流通的加速与重塑[J]. 当代经济研究, 2022, (8).
- [8] 程思富, 余晓爽.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垄断与掠夺路径分析[J]. 理论月刊, 2023, (9).
- [9] 谢富胜, 江楠, 吴越. 数字平台的收入来源与获取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分析[J]. 经济学家, 2022, (1).
- [10] 朱悦衡, 王凯军. 数字劳工过度劳动的逻辑生成与治理机制[J]. 社会科学, 2021, (7).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211.
- [12] 李国杰, 程学旗. 大数据研究: 未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现状与科学思考[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2, (6).
- [13] 徐翔. 数字经济时代: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新经济发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04.
- [14][15][21][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38, 127, 281, 480.
- [16] 翟云. 如何理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N]. 学习时报, 2022-09-19.
- [17] 武兴伟. 以疏通流动性畅通“三个循环”[N]. 学习时报, 2020-05-20.
- [18] 李杨, 陈寰琦, 周念利. 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J]. 国际贸易, 2016, (10).
- [19] 姜英华. 论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 (3).
- [20] 韩文龙. 平台经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及其批判与超越[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6).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5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13.
- [24] 刘伟杰, 周绍东. 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J]. 西部论坛, 2021, (5).

作者: 尹凡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钟晓媚